

人文社科博士文库系列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1800 ~ 1911)

Chinese Dialect Group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Malaya, 1800~1911

王付兵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1800 ~ 1911)

**Chinese Dialect Group Distribution and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Malaya, 1800 ~ 1911**

王付兵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1911 / 王付兵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2.4
(人文社科博士文库系列丛书)
ISBN 978-7-5489-0769-5

I . ①马… II . ①王… III . ①华人—方言研究—马来亚—1800~1911②华人—职业—结构—研究—马来亚—1800~1911 IV . ①D634.33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6079 号

责任编辑: 赵文红 吴应权

装帧设计: 连小楠

责任校对: 梁 红 张 怡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1800~1911)

王付兵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0769-5
定 价 39.8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电 话 0871-4110043(编辑部) 4107562(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yunart.cn>

本书是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A09002S）“1786 至 1911 年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方言群和职业结构”、福建省社科规划 2011 年度项目（2011B220）“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 ~ 1911）”的阶段研究成果。

本书出版得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全额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意义与目的.....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12
四、相关术语的界定	14
第一章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18
第一节 19世纪前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18
一、15世纪前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18
二、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满刺加王国时期）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23
三、1511~1640年（葡占马六甲时期）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26
四、1641~1786年中国人向马来亚的移民	28
第二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向海峡殖民地的移民	32
一、中国人向马六甲的移民	32
二、中国人向槟榔屿的移民	35
三、中国人向新加坡的移民	41
第三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人向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移民	47
一、中国人向马来联邦的移民	47
二、中国人向马来属邦的移民	52
第二章 1641~1824年（荷占马六甲时期）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58
第一节 马六甲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58
一、华人人数的缓慢增长	58
二、马六甲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61
三、马六甲华人的职业结构	62
第二节 柔佛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63
一、柔佛华人的数量变化	63
二、柔佛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65
第三节 吉兰丹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65
一、吉兰丹的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概况	65
二、吉兰丹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67

三、吉兰丹华人的职业结构	68
第四节 吉打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69
一、吉打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69
二、吉打华人的职业结构	69
第三章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	71
第一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71
一、英国对马来亚的侵占	71
二、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72
三、马来联邦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79
四、马来属邦华人的方言群分布	92
第二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职业结构	98
一、海峡殖民地华人的职业结构	99
二、马来联邦华人的职业结构	123
三、马来属邦华人的职业结构	150
第四章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和职业的关系	173
第一节 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	173
一、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	173
二、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的主要原因	175
三、福建人富商的政治态度	180
第二节 甘蔗、甘蜜等经济作物种植业者多为潮州人	182
一、甘蔗、甘蜜等经济作物种植业者多为潮州人	182
二、甘蔗、甘蜜等经济作物种植业者多为潮州人的主要原因	183
三、潮州人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态度	185
第三节 客家人和广府人多从事开矿和手艺活动	188
一、客家人和广府人多从事开矿和手艺活动	188
二、客家人和广府人多从事开矿和手艺活动的主要原因	190
三、客家人和广府人富有矿家、工匠与矿工的政治态度	192
第四节 20世纪初福建人成为马来亚华人最大方言群的主要因素	196
一、闽南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状况	197
二、移民网络的作用	200
三、福建人较早在马来亚海岸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影响	203
结 论	205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25

绪 论

一、研究意义与目的

1800~1911年（全书简称“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新马华人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该时期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是新马华人史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华人居住地新加坡、马来西亚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专题的学理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人集中居住的两个主要国家

笔者根据1947年马来亚殖民地官方人口调查报告统计：1911年马来亚华侨人口总计919 200人，约占当地总人口2 653 531的34.6%；1921年马来亚华侨人口总计1 179 138人，约占当地总人口3 341 559人的35.3%；1931年马来亚华侨人口总计1 708 966人，约占当地总人口4 358 658人的39.2%。^① 1957年马来亚殖民地官方人口调查报告显示：1947年马来亚联合邦华侨人口约1 885 000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约4 908 000人的38.4%；同年新加坡华侨人口为729 473人，约占当地总人口938 144人的77.8%；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华侨人口约2 333 756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约6 278 758人的37.2%；同年新加坡华侨人口为1 090 596人，约占当地总人口1 445 929人的75.4%。^② 1965年新马分治后至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仍是海外华人集中居住的国家。据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的估计，2007年新加坡华侨华人约360万，占当地总人口468万的77%；2006年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约645万，占当地总人口2 664万的23.7%。^③

（二）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之研究，对了解当时乃至20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人的社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和较客观地认识当时的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对了解20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华人的社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上半叶的马来亚华人社会结构实际上继承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社会结构的特征：那就是福建人主要分布在海峡殖民地，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多为福建人的特点；森美兰的双溪芙蓉、霹雳的拉律及近打区、雪兰莪的吉隆坡、乌鲁雪兰莪及巴生盆地，在19世纪中后期以产锡著称，而客家人和广府人当时就主要在这些地方从事锡矿开采，这造成了20世纪上半叶

^① 1947年马来亚各邦人口调查报告提供有1911、1921和1931年马来亚各邦总人口及其华人人口数。参阅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2~234.

^②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32, 227, 229.

^③ 庄国土：《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载《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64、66页；王望波、庄国土编著：《2008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4、17页。

2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 ~ 1911）

广府人和客家人在这些地方占当地华人人数较多的后果；以农业经济命脉为主的柔佛州，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流行港主制度，当时开港的港主多是潮州人，在港区种植甘蜜和胡椒的种植园主和华工也多是以潮州人为主，造成19世纪中后期柔佛的华人方言群以潮州人为主。20世纪一二十年代，福建人因在柔佛从事橡胶种植，由此在柔佛逐渐取代了潮州人，但潮州人在1911 ~ 1947年期间，仍在居林、瓜拉武打、新山、龟咯占人口优势；^① 在吉兰丹、玻璃市州和丁加奴州，因福建人较早从事商业活动，结果至20世纪初时，这些地方的华人以福建人人数最多，至1947年时，这些地方仍是福建人的天下。^②

（三）期望能弥补学术界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方面之研究薄弱

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资料分布很零散，可资利用的主要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官方人口统计报告、现存的华文碑铭资料和华人社团本身的历史文献，如庆典纪念特刊、华文报刊等。此外，晚清政府官员的奏疏、晚清时期到南洋游历的中国官员和文人记载的文献，也是了解当时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可资参考的文献。受资料的零散和不足限制，学术界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之研究相当薄弱。本文期望在较系统地利用中外文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较客观地构建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情况，以期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也希望能对同时期东南亚其他区域华人社会结构之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四）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职业结构之研究，对了解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职业结构的建构，我们可发现，当时马来人王权、英国殖民者如何与华人互动。马来人王权、英国殖民者与华人的互动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近代史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职业结构也是当时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呈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论述这段时期的经济史，不可抛弃华人的经济活动，而华人的职业结构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华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笔者以为，要较客观地构建出近代新加坡、马来西亚历史，华人职业结构的研究绝不可忽略。

（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富有华商至今仍以福建人为主，与福建人较早以从事商业为主有关系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政府进行重大的经济政策改变。过去政策和计划是纯粹基于经济理由而作，现在已转变为以种族为基础。^③ 这就是为了提高和确保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以消除种族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根源，马来西亚政府在1970年宣布实施扶助马来人、抑制华人的“新经济政策”。^④ 它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社会贫困和重组社会，以纠正种族间的

^①麦留芳著：《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第91页。

^②麦留芳著：《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第85、88页；吴华著：《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1980年，第50页。

^③林水樟、何启良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326页。

^④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

经济差距。其中一个具体目标就是：到 1990 年，外国资本在马来西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占有比例从 63.3% 降至 30%；马来人资本的拥有权比例从 2.4% 提高到 40%；华人、印度人等非马来人资本比例从 34.3% 提高到 40%。^① “新经济政策”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职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很多华人经营的矿业和种植业转入马来人手中，^② 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方面，华人雇员的比例显著降低。^③ 1991 年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实施了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即国家发展政策，其核心任务是：通过加快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到 2020 年，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的”国家。国家发展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华人在制造业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领域，华人就业人数继续减少，在所占比例中也进一步变小。华人就业地位处在不断下降中，马来人就业地位处在不断上升中。^④

马来西亚华人就业地位虽然处在不断下降中，但是华人企业家，尤其闽南籍企业家仍在当地工商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⑤ 据笔者统计，在 2010 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布的《2009 全球华商富豪 500 强》排名榜中，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家族）占 8 席：郭鹤年（籍贯为福州）、李深静（籍贯为永春）、郑鸿标（籍贯为潮州）、郭令灿（籍贯为同安）、杨忠礼家族（籍贯为金门）、张晓卿（籍贯为闽清）、陈志远（籍贯为永春）、钟廷森（籍贯为潮阳），在方言群归属上为闽南人的共有一半，即李深静、郭令灿、杨忠礼家族、陈志远。

1945 年 9 月英国恢复在新加坡的统治，并把新加坡从海峡殖民地单列出来，新加坡由此成为独立的直辖殖民地（1946～1958 年）。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谈判，英国被迫在 1958 年 4 月与新加坡代表签订《关于新加坡自治宪法草案》，被迫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邦，实行内部自治。1959 年 6 月 30 日，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1963 年 9 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北婆罗洲、沙捞越联合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 年 8 月 9 日宣布脱离联邦独立，称新加坡共和国。独立 40 多年来，新加坡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以制造业、贸易、港口、金融为支柱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⑥ 主导新加坡经济的两大资本是外国资本和本地资本。前者在制造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并与本地资本中的华人资本各控制一半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后者包括

^① 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93 页；郭梁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5～176 页。

^② 庄国土、刘文正著：《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24 页。

^③ 林水樟、何启良等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年，第 332～333 页。

^④ 林勇著：《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1、216 页。

^⑤ 2010 年 11 月 2 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致马来西亚智库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主办、绿野集团协办的第二届世界经济华人论坛的演讲词时，提到：华人对马来西亚经济贡献良好，也是经济的支柱，若没有华人的支持，马国的未来将会是暗淡的。他承认，若没有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和奉献，马来西亚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而且也无法在 2020 年达到先进国的目标。参阅《纳吉：华人贡献大，马国没有华人支持前程黯淡》，见 http://www.zaoobao.com/yx/yx101103_004.shtml。

^⑥ 赵和曼主编：《东南亚手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93、304 页；魏炜著：《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 页。

政府资本、华人资本等。政府资本掌握的大型企业较多，华人资本以金融贸易、房地产、旅游业为主。^① 在殖民地时代，华人尤其闽南人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就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新加坡华人，尤其闽南人仍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笔者统计，在2010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布的《2009全球华商富豪500强》排名榜中，新加坡华人企业家（家族）占14席：黄廷芳家族（籍贯为莆田）、黄祖耀家族（籍贯为金门）、郭孔丰（籍贯为福州）、郭令明家族（籍贯为同安）、林荣福（籍贯为莆田）、李成伟（籍贯为南安）、何森源（籍贯不详）、郭令奇（籍贯为同安）、张允中（籍贯为金门）、林爱莲（籍贯为莆田）、何光平（籍贯不详）、蔡天宝（籍贯为晋江）、郑维强家族（籍贯为潮阳）、钟世平（籍贯不详）。在方言群归属上明确知道属于闽南人的共有6席，即黄祖耀家族、郭令明家族、李成伟、郭令奇、张允中、蔡天宝。闽南人占了四成多。

马来西亚、新加坡闽南人在当地经济发展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闽南人较早在当地以从事商业为主有关。

拙著之研究目的主要有：在运用较大量的原始文献和参考国内外学者相关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希望可以让人较客观地认识当时新马华人的社会结构，并有助于人们较清晰地认识当时新马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内在联系，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希望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新马华人社会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较深入研究，期望推动同时期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以期有助于人们对晚清时期南洋华人社会的较清晰和较客观的认识。

二、学术史回顾

因资料的零散和不足，国内外学术界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研究仍很薄弱。

在国外，新加坡华人社会领袖、潮州籍商人余有进（Seah Eu Chin）在1848年就较详细和准确地描述了当时新加坡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J. D. 沃恩（J. D. Vaughan）在1854年也注意到当时槟榔屿华人的职业结构情况。^② 19世纪新加坡的华文报刊——《叻报》和《天南新报》，对新加坡华人各方言群的职业情况也有所记载。^③

新加坡华人律师宋旺相（Song Ong Siang）于1923年著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是一部记录新加坡华人百年发展的编年史著作，^④ 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历史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了解当时新加坡华人尤其著名华人的商业活动与种植业发展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1921年至1946年，曾在英属马来亚政府担任过华民护卫司（Protector of Chinese）、华文副提学司（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Chinese〉）及情报局主任（Director - General of Information）等职，马来亚光复后任英军政府的华人事务顾问官（Principal Adviser

^①郭梁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

^②Yen Ching - 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7.

^③麦留芳著，张清江译：《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第55页。

^④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London, 1923.

on Chinese Affairs to the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的英国人布赛尔 (Victor Purcell, 东南亚华人一般将其译为“巴素”) 著的《东南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乃研究东南亚华人的英文名著,^①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对新马华侨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有一定的论述, 但他却没探讨新马华侨的方言群和职业结构中存在的内在联系, 对华人从事的商贸活动和木薯、甘蜜等种植业的经济活动的论述也很薄弱。他的另一本著作《马来亚的华人》(The Chinese in Malaya) 是一本论述马来亚华人历史演变的英文著作,^② 对了解 1946 年以前马来亚华人的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对新马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的研究同样很薄弱。

新加坡学者黄存燊 (Wong Choon San) 于 1964 年完成的《华人甲必丹》(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论述了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土邦吉打、玻璃市、霹雳华人甲必丹对当地开发和发展的贡献,^③ 对笔者了解早期新马华人领袖的经济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 该书未能对马来亚其他州的华人甲必丹作详尽的论述。之后陆续有学者, 如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新加坡学者庄钦永、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等, 对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华人甲必丹作进一步研究。^④

新加坡著名的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专家许云樵, 1977 年在其论文《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⑤ 靥要论述了华人移居马来亚的历史, 对笔者了解早期华人移民马来亚的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另一篇论文《柔佛华人拓殖史》,^⑥ 论述了柔佛的港主制度, 对笔者了解 19 世纪华人移民尤其是潮州人移民移居柔佛的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知名华人学者王赓武在其著作《南洋华人简史》、《中国与海外华人》、《海外华人: 从乡土中国到自治的探索》(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中对东南亚华人历史之变迁、华人移民的类型、海外闽南人的深刻分析,^⑦ 对笔者了解近代新马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颜清湟的著作《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⑧ 是迄今为止研究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最全面、权威的著作。在论述辛亥革命前新马华人的社会结构

^① 该书初版于 1951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5 年该书出版第二版。1966 和 1980 年该书又重印出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前身) 于 1957 和 1958 年曾组织人员翻译该书, 最终成果发表于《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 年第 4 期和 1958 年第 1~3 期。译者将该书书名译为《东南亚的中国人》。以后, 中国台湾学者郭湘章亦翻译该书。书名为《东南亚之华侨》, 台北国立编译馆 1966 和 1974 年出版。

^②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③ 黄存燊著, 张清江译:《华人甲必丹》, 新加坡: 国家语文局, 1965 年。

^④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阅黄存燊等著, 张清江编译:《新马华人甲必丹》, 新加坡: 亚洲研究学会, 2006 年。

^⑤ 许云樵:《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 载《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1977 年。

^⑥ 许云樵:《柔佛华人拓殖史》, 载《柔佛州中华总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新山: 柔佛州中华总会, 1986 年。

^⑦ 王赓武著:《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8 年; 王赓武著, 张奕善译注:《南洋华人简史》, 台北: 水牛出版社, 2003 年; 王赓武著, 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与海外华人》,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1800 ~ 1911）

时，作者指出不同方言群的华人在职业方面确实存在不同的差别。由于该书的主题是论述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因而他对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新马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另一专著《新马华人社会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 1911*）利用英国官方档案资料、清朝官方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华人社团记录及其出版刊物等，^① 主要探讨了 1800 至 1911 年英属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职能，是研究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新马华人社会的重要著作，对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社会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对新马华侨的方言分布与职业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笔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所探讨的主要是在海峡殖民地范围内华人方言群与其职业活动的关系，对其他地区如雪兰莪、森美兰、霹雳等的探讨则较欠缺。此外，其在一些论文如《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 1911*）《早期新马华人宗亲组织》（*Early Chinese Clan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19 ~ 1911*）、《1900 年前新马早期的福建人移民与社会组织》（*Early Fukienese Migr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1900*）、《早期新马的客家方言组织》（*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1 ~ 1900*）和《新马华族的传统行业组织》（*Traditional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等论述了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新马华人方言群与职业垄断的关系、海峡殖民地福建人的职业结构、新马福建人与客家人的移民与定居、新马华人宗亲组织和方言组织的建立及其作用、传统的华人商业组织对新马工商垄断某些行业的作用等方面内容，^② 对笔者研究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新马华人社会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存燊之子、新加坡学者黄麟根（Wong Lin Ken）著的《1914 年前的马来亚锡矿工业：特别提到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这些州》（*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③ 利用大量的殖民地政府档案，论述 1874 ~ 1914 年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地华人锡矿业与西方锡矿业发展情况的著作，对了解近代马来亚华人锡矿业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论文《1914 年以前西方企业以及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中，^④ 他同样利用了大量的殖民地政府档案，分析了 1914 年以前马来亚锡矿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和及其发展情

^①Yen Ching 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 ~ 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林水樞、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1984 年，第 201 ~ 229 页；颜清渥著：《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 年，第 149 ~ 178 页；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3 ~ 31；颜清渥著：《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5 ~ 130 页；Yen Ching-hw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pp. 51 ~ 78；颜清渥著：《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年，第 3 ~ 28 页。

^③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 Tucson :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④黄麟根著，颜清渥译：《1914 年以前西方企业以及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南洋学报》第 20 卷第 1、2 合辑（1965 年份），新加坡：南洋学会，1966 年，第 19 ~ 47 页。

况，该论文是其著作《1914 年前的马来亚锡矿工业》的精华体现；其另一篇论文《1805 ~ 1830 年间槟榔屿的捐税包收》（*The Revenue Farms of Prince Wales Island, 1805 ~ 1830*），^① 同样地利用了不少殖民地政府档案，论述 1805 ~ 1830 年间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饷码承包情况，对了解这时期该岛华人的饷码承包活动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英国学者詹姆斯·杰克逊（James C. Jackson）著的《垦殖民与冒险家：1786 ~ 1921 年马来亚华人与欧人的农耕业》（*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 ~ 1921*），^② 利用殖民地政府档案和英文报刊等文献，论述华人和欧人在马来亚拓荒垦殖的情况，对了解 19 世纪马来亚华人的种植业发展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华人学者李保平（Lee Poh Ping）著的《19 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③ 是研究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商业社会的历史著作。书中对新加坡华人商人阶层的性质和来源、华人商人阶层和其他华人社会阶层的关系、华人商人阶层与英殖民当局的关系作了一定的探讨。然而，正如黄麟根、邱家金与颜清湟等指出，该书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自由贸易社会与胡椒甘蜜社会的存在，其有关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暴力冲突频繁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的自由贸易社会与现存的胡椒甘蜜社会冲突的理论，因而也难以成立。^④ 尽管如此，该书对笔者探讨 19 世纪新加坡华商的方言群分布与职业结构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美国学者卡尔·A·特洛基（Carl A. Trocki）著的《海盗王子：1784 ~ 1885 年天猛公与柔佛和新加坡的发展》（*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men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e and Singapore 1784 ~ 1885*），^⑤ 论述 19 世纪传统马来邦柔佛体制的变迁，对我们了解 19 世纪新加坡、柔佛华人甘蜜和胡椒业的发展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另一本著作《鸦片和帝国：1800 ~ 1910 年新加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 ~ 1910*），^⑥ 分析 1800 ~ 1910 年新加坡华人的鸦片饷码承包活动与秘密社会情况，及鸦片与当时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政治经济的关系，对笔者了解当时新加坡华商的鸦片饷码承包活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霹雳州怡保的华人学者麦留芳（Mak Lau Fong）于 1981 年著的《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是论述新马华人私会党问题的社会学专著。^⑦ 在该书第四章，作者扼要探讨了海峡殖民地早期华人方言群和行业类型的联系，认为行业垄断模式长久存

^① 该论文发表于《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第 19 卷第 1、2 辑合辑（1964 年份），新加坡：南洋学会，1965 年，第 56 ~ 127 页。

^② James C. Jackson,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 ~ 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③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④ 颜清湟：《新马华人研究的反思》，见颜清湟著：《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61 页。

^⑤ Carl A. Trocki, *Prince of Pirates: The Temmengong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ohore and Singapore 1784 ~ 188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⑥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 ~ 191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⑦ “私会党”，学术界亦称为“秘密社会”、“秘密公社”或“秘密会党”。

在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华人私会党的作用结果。^① 在1984年撰写的论文《早期华人社会组织与星马城镇发展的模式》中，他对近代至马来西亚独立之前新马华人方言群的聚落形态和新马城镇的发展模式作了探讨。他认为，方言群的聚居地区，大致上是系于职业行业，经济或生产的方式。要造成行业垄断的局面，非有一庞大且具压抑性的组织如天地会式的组织不可。^② 麦留芳于1985年著的《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③ 探讨近代至马来亚独立前华人的方言群认同问题。其于1995年完成的专著《早期马来亚华人方言群之动态》（*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④ 则是论述近代至马来西亚独立前华人方言群的种类、职业分工、与华人秘密社会及宗教活动关系等内容的著作。上述二书从社会学角度对近代至马来亚独立前新马华人的方言群认同、职业结构及其二者的关系在宏观上作了一定的论述。麦留芳的上述研究成果，对笔者探讨华人方言群分布与职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他对华人追逐经济利益、宗亲和方言组织、华商经贸网络和马来人文化特性等其他因素的缺乏考虑，使得其对华人方言群分布与职业行业关系的探讨无法令人满意。

新加坡学者崔贵强著的《吉兰丹华人》，^⑤ 探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吉兰丹华人历史的变迁，对笔者了解早期的吉兰丹华人的人口规模与经济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撰写的《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⑥ 是一部较全面论述新加坡华人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著作，书中对新加坡华人的职业结构、方言群与职业的存在关系作了一定的论述。受全书结构的影响，该著作未能深入探讨华人方言群与职业的关系。

美国人类学学者柯雪润（Sharon A. Carstens）于198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图像》（*Images of Community in a Chinese Malaysian Settlement*），^⑦ 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述了吉兰丹布赖村客家人开采金矿及其在当地生活的情况，对笔者了解布赖客家人的金矿开采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学者李业霖主编的《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⑧ 收录曾任英国殖民政府华民护卫司米德尔布鲁克（S. M. Middlebrook）对叶亚来历史事迹的研究，及美国人类学学者柯雪润（Sharon A. Carstens）对叶亚来的研究论文，^⑨ 对笔者了解叶亚来与吉隆坡的开发、吉隆坡华人锡矿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槟榔屿学者张少宽著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⑩ 收录作者于20

^① 麦留芳著，张清江译：《星马华人私会党的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第59~71页。

^② 麦留芳：《早期华人社会组织与星马城镇发展的模式》（《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抽印本），台北：“中央研究院”，1984年，第397~402页。

^③ 麦留芳：《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5年。

^④ Mak Lau Fo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Dialect Groups in Early Malay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5.

^⑤ 崔贵强著：《吉兰丹的华人》，新加坡：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76年。

^⑥ 崔贵强著：《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4年。

^⑦ Sharon A. Carstens, *Images of Community in a Chinese Malaysian Settlement*. Unpublished PhD di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0.

^⑧ 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1997年。

^⑨ 柯雪润（Sharon A. Carstens）关于叶亚来的研究，亦可见于她的论文集：Sharon A. Carstens, *Histories, Cultures, Identities: Studies in Malaysian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56.

^⑩ 张少宽著：《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年。

世纪 70 年代初在槟榔屿搜集到的福建公私家的碑刻资料，对我们了解近代槟榔屿福建人的籍贯来源和商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氏结合其三十多年在槟榔屿的田野调查和搜集的文献，对槟榔屿华人的早期历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关于槟榔屿华人社会早期历史研究的著作《槟榔屿华人史话》、《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和《槟榔屿丛谈》等，^① 对笔者探讨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学者黄佩萱（P. Lim Pui Huen）著的《黃亚福：移民、建筑商、企业家》（*Wong Ah Fook: Immigrant, Builder and Entrepreneur*），^② 作者是柔佛甲必丹黄亚福的曾孙女，她利用柔佛州档案局馆藏档案、家族记录资料及访问调查、学者相关著作等资料对黄亚福的一生进行了勾画，对笔者了解近代新山华人的开发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对黄亚福研究最深入的著作。

马来西亚学者李永球著的《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③ 是作者十余年田野调查的重要成果，对笔者了解霹雳州拉律马当县（Daerah Larut Matang）太平镇华人的方言群分布、职业结构和早期华人领袖的基本活动情况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④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学者郑良树著的《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⑤ 论述近代潮州人在柔佛州的生存与发展，对笔者了解柔佛州潮州人的地区分布与职业结构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该校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的《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⑥ 为 2001 ~ 2002 年柔佛州属内的 11 间潮州会馆与南方学院联合进行的“搜集柔佛潮州人历史资料合作计划”的正式成果。该书对了解潮州人移民柔佛州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里收录南方学院学者安焕然的论文《马来西亚柔佛潮人的开垦与拓殖——以“搜集柔佛潮州人历史资料合作计划”成果论述》，^⑦ 对笔者了解潮州人在马来西亚柔佛的开港、种植甘蜜（gambier）和胡椒的活动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邱思妮（Khoo Salma Nasution）与其夫君阿都·拉扎克·鲁毕斯（Abdur – Razzaq Lubis）合著的《近打峡谷：开创性的马来西亚近现代发展》（*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⑧ 利用档案资料、报刊资料及相关著述论述了霹雳州近打县的发展史，对笔者了解近打华人锡矿业的兴起、发展与衰弱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荆和、新加坡学者陈育崧 1971 年编著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和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Chen Tieh Fan）合

^① 张少宽著：《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02 年；张少宽著：《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槟榔屿：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 年；张少宽著：《槟榔屿丛谈》，槟榔屿：南洋田野研究室，2005 年。

^② P. Lim Pui Huen, *Wong Ah Fook: Immigrant, Builder and Entrepreneur*,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2000.

^③ 李永球著：《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槟榔屿：南洋民间文化，2003 年。

^④ 太平，北霹雳的行政中心，原名拉律（Larut），别名“雨城”，华人俗称“小霹雳”。

^⑤ 郑良树著：《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士古来（Sekudai，属柔佛州新山县）：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年。

^⑥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年。

^⑦ 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中心编纂：《潮人拓殖柔佛原始资料汇编》，士古来：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623 ~ 650 页；安焕然著：《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士古来（Sekudai）：南方学院出版社，2003 年，第 411 ~ 462 页。

^⑧ Khoo Salma Nasution & Abdur – Razzaq Lubis, *Kinta Valley: Pioneering Malaysia's Modern Development*, Ipoh: Perak Academy, 2005. 马来西亚学者何启才告诉笔者，Khoo Salma Nasution 即华人邱思妮。

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碑铭资料汇编，^① 是了解 17 世纪至 20 世纪 10 年代新马华人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亦是了解同时期新马华人方言群分布与职业活动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二书所收录的早期新马华文碑铭资料对新马华人史研究文献的拓展具有开创之功。书蠹（Bookworm）编的《槟榔屿开辟史》，^② 是收录英国殖民者莱特开辟经营槟榔屿殖民地活动的历史著作，对笔者了解早期槟榔屿华人的人口规模和职业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国内，清代官员和文人就已关注马来亚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问题。18 世纪末曾游历东西方沿海国家的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③ 在游记《海录》中就提到吉兰丹、马六甲、雪兰莪、槟榔屿、吉打华人的职业结构情况。^④ 1885 年曾游历新加坡的上海人李钟珏（1853~1927 年）在其著作《新加坡风土记》提到：“潮州商人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钜，他商不能及。”在该书，他又介绍了 1891 年新加坡华人的方言群分布情况。^⑤ 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四上奏（1887 年 12 月 8 日）朝廷的奏疏中提到，马六甲、槟榔屿“华裔居多，生意繁盛”，“石郎阿国（即雪兰莪）之吉隆埠（即吉隆坡），卑力国（即霹雳）之鱉埠（疑指太平）……（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⑥ 光绪十七年（1891 年）南游至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永泰人力钩（1885~1925 年）在游记《槟榔屿志略》中，^⑦ 记载有 1881 年槟榔屿和威斯利省华人的方言群分布情况。^⑧ 晚清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外交家薛福成在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一（1893 年 2 月 27 日）的奏疏《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中，提到了南洋华人的方言群大致分布情况，并指出“闽人多富商巨贾”。^⑨

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的学者陈达，在其关于南洋华侨与闽粤侨乡之关系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就较早扼要地谈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洋华侨的方言群分布及其从事的主要职业。他指出华侨在南洋的地理分布有两个特点：同乡聚居一

^① 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1 年；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Chen Tieh Fan）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共三卷），吉隆坡（Kuala Lumpur）：马来亚大学出版部（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第 1 卷〈Vol. 1〉，1982 年，第 2 卷〈Vol. 2〉，1985 年，第 3 卷〈Vol. 3〉，1987 年。

^② 书蠹（Bookworm）编，顾因明、王旦华译：《槟榔屿开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③ 谢清高，广东省嘉应州金盘堡人（今广东梅州一带），大约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 年），18 岁时，航海遇风翻舟，被葡萄牙船救起，跟随其到各国贸易，曾到过英、葡等国。后寄居澳门。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谢清高在澳门遇其同乡、举人杨炳南，向其叙述了海外见闻。杨氏一一记录下来，经过加工整理，最终成书，定名《海录》。次年，即道光元年（1821 年），谢氏病逝。

^④ 关于华人在这些地方的职业活动情况，参阅（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吉兰丹”、“麻六甲”、“沙喇我国”、“新埠”、“吉德国”等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5、45、48、51、53 页。

^⑤ （清）李钟珏著，许云樵校注：《新加坡风土记》，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 年，第 8 页下。

^⑥ 《张之洞奏为派员访查南洋各埠情形事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第 44 页。

^⑦ 厦门大学聂德宁教授认为，从书首作者所作的“自识”来判断，该书当在光绪辛卯年（1891 年）冬付印。参阅聂德宁：《〈槟榔屿志略〉与槟城华侨史料》，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65 页。

^⑧ 力钧：《槟榔屿志略》，卷 4，“流寓志”，双镜庐集字板排印，光绪辛卯年（1891 年），第 8 页。

^⑨ 薛福成：《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薛福成著：《庸庵文编》，卷 1，第 39 页下、第 40 页下。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5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年，第 1166、1168 页。又见《薛福成奏请豁除海禁以护商民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第 92、93 页。

处；同乡加入一业。^①他应是宏观地将华人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联系起来的较早学者。此外，他关于侨乡的环境及当地人民从事主要职业的论述，对笔者了解闽粤人民迁移南洋的背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华侨研究室著的《东南亚华侨通史》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篇，^②系统地论述东南亚华侨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并阐明这些变化的规律性。在该书中，庄国土教授论述了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的东南亚华侨的人口结构，^③对笔者深入探讨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马华侨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庄国土教授的另两本著作《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该书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作的历史与现状作了系统的考察）、《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该书论述东亚地区华人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中国大陆互动的历史，阐述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华人经济体间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中，^④作者进一步探讨了17世纪初至20世纪前期东南亚华人的人口结构，还对二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华人的人口结构作了宏观的探讨。二书对笔者较系统地探讨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马华侨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结构，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对11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人移民和海外华商网络的历史演变的分析，对笔者了解同时期新马闽南人从事的主要职业情况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暨南大学林远辉、张应龙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⑤是国内外首部较系统论述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前新马华人历史的著作。该著作对华侨从事的经济活动有较详细的论述，对我们了解19世纪至马来亚争取独立时期新马华侨的职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虽然指出新马华侨的方言群分布和职业构成有一定的关系，但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限制，未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学者吴小安（Wu Xiao An）著的《马来国家形成中的华人商业，1882～1941：吉打和槟城》（*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⑥乃作者199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基础上而修改完成。该书利用英国殖民地官方档案、报刊、社团刊物、专著和访谈材料等文献，通过个案研究的形式，集中探讨了1882～1941年吉打、槟城的华商网络与本地区及更远地区的关系。作者认为，吉打、槟榔屿的华商活跃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变迁，他们在地区整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将华商网络研究放在族群性、国家与区域三者互动的背景下进行，对笔者理解吉打、槟榔屿的华商经贸活动，及其他们与英国殖民当局、马来王权的互

^①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50～51页。

^②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庄国土关于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的东南亚华侨的人口结构的分析，亦可参阅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明末南洋华侨的数量推算和职业、籍贯构成》、《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口结构》和《鸦片战争后东南亚华侨人口结构》，分别载于《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第16～21页）、1992年第1期（第65～72页）和1994年第1期（第1～9页）。

^④庄国土著：《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6页；庄国土、刘文正著：《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林远辉、张应龙著：《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⑥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